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初稿)

孙定国

B038

21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人民羣众和个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科学地解决人民羣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在革命的實踐中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

列宁在反对抵制一文中，極簡明極深刻地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全部內容。他說：“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論不同，它精妙地結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完全用科学冷靜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方面是極坚决地承認羣众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的意义，同时当然也承認那些善于探索并实现其与某些階級联系的个别人物、集团、組織和政党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的意义。”①一方面是历史和革命發展的客观規律性的問題，一方面又是人民羣众和个人以及政党的作用的問題，而在第二方面又首先是人民羣众的作用問題，这就是这个問題的全部內容。把这两个特点精妙地結合起来，就是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論的特點，它既具有如此的重要性，而又充滿着深刻的辯證关系，我們就不能不全面地来掌握它。

在这一講里，我們將要講到下列題目：

一、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关于人民羣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錯誤理論。

二、人民羣众是历史的創造者，是历史發展的決定力量；

三、人民羣众的創造力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建設条件下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①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 1949年莫斯科版，第199頁。

四、正确地估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五、在实际工作中發揚党的羣众路綫的傳統，貫徹执行集体領導和党内民主的原則，为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風而斗争。

一 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錯誤理論

历史唯心主义的社会观和历史观，不是从意志論出發，就是从宿命論出發。意志論者認為个人的智慧、个人的意志是决定一切的；宿命論者則又認為上帝或神的智慧和意志是决定一切的。不論是意志論者还是宿命論者，都不承認社会、历史的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性，都不承認人民羣众在社会、历史發展中的决定性的作用，它們殊途而同归地把人民羣众排斥于历史發展的軌道之外。这两种思潮，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的主要思潮，而它的思想內容在實質上却仍然是过去的反动統治阶级的統治思想的繼續和發展。

中国的封建思想家就曾經长期地喧嚷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云从龙、風从虎、聖人作而万物睹”等愚民的調子。受到十九世紀德國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英国的著名的封建阶级思想家卡莱尔，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同样地得出如下的結論：“全世界的历史，即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完成的历史，依我的見解，實質上就是那些在地球上辛勤劳作的偉大人物的历史……这些偉人的历史，真正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灵魂”。

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历史民族”和“非历史民族”的理論部分，显然是宿命論的历史观的一种表現；而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又恰恰是意志論的历史观的强烈表現。尼采說：“毫无疑义，人类与

其說是目的，不如說是手段……人類不過是供實驗的材料，一大堆多餘的廢品，一片瓦礫場”，而只有“超人”可以為了追求自己的權慾，在烈火和血泊中昂頭前進。美國的實用主義者詹姆士和杜威認為歷史就是人類心理活動的歷史，杜威認為只有出類拔萃的人——也就是大資本家——才能管理國家。這也同樣是露骨的历史唯心主義。黑格爾的理論被新黑格爾主義者加以擴大和發展為帝國主義服務，尼采的思想成為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基礎，詹姆士和杜威的思想成為美帝國主義的國家哲學——這都不是偶然的。因為這種“理論”對於壟斷資本的擴張和進行帝國主義侵略戰爭，都是最好的護符。這種“理論”在舊中國，也曾經發生過巨大的影響作用，胡適積極地宣傳詹姆士、杜威的實用主義歷史觀，而把人們分成：中行、高明、沈潛三種性質，來符合詹姆士的哲學家有硬心派和軟心派的胡說。他主張“好人政府”和“好人政治”，這些好人，就是他所說的“社會上的優秀分子”，只要這些分子“加入政治運動”，就可以組成“好人政府”，實現“好人政治”；他公開地推崇閻錫山是“模範督軍”，吳佩孚是“很可欽佩”的“軍事天才”，梁啟超和張謇是“人心所歸”的“中堅”，甚至於無恥地說：“日本一個小國，那末貧瘠的土地，那末少的人民，只因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幾十個人的努力，……居然在半個世紀之內一躍而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正是在這種極為反動的历史觀指導下，胡適才投入蔣介石的懷抱，寄居美帝國主義簞下而長期與中國人為敵。胡風是意志論的熱烈擁護者，由於和尼采哲學息息相關的叔本華伯格森的哲學思想構成了他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文艺理論的世界觀的基礎，因而在胡風的全部言論中充滿着尼采的“超人”思想，他狂妄地吹噓着：“自我擴張”，“人格力量”，“主觀戰鬥精神”等“理論”，他認為：“作家通過自己的精神力量，……創造出一個特異

的精神世界”。胡風把人民看成是虫豸和蒼蠅，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蠢动着的生活形象。正是在这种极为反动的历史观指导下，胡風才以蒋介石的忠实間諜的身份长期地潜伏在革命内部来破坏革命。至于作为蒋介石的嫡系的反动理論家如陶希聖、陈立夫之流，不是重版封建阶级的反动历史观，就是抄襲法西斯的反动历史观，作为蒋介石的所謂“民族至上”（就是四大家的至上），“国家至上”（就是四大家族的至上），“一个党、一个領袖、一个主义”的理論基础，借以維持反动統治，屠杀中国人民。他們的反动理論同样是意志論宿命論的变种。这只要看一看陶希聖（代蒋介石）所写的“中国的命运”和陈立夫所写的“唯生論”就够了。

显然，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是有它的深刻的阶级根源的。它們作为历史上私人占有制的統治者，是不可能承認人民羣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的作用的。因為它們承認了这一点，就等于否認了它們自己在历史上的統治地位。而只有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这不論是意志論还是宿命論，才有利于它們对劳动者在經濟上的剝削和政治上的統治。为此，这种历史观才成为阶级社会的长期的統治思想。

关于人民羣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問題，我們再分析一下梁啟超以及俄国的民粹派的观点特別是分析一下偉大的孙中山先生的观点是有很大大意义的。

梁啟超有两篇文章涉及了这个問題，而从这两篇文章都可以看出梁啟超对这个問題的惶惑莫解的情况。

一篇是“英雄与时势”。

他写道：“‘或云英雄造时势，或云时势造英雄’此二語皆名言也。为前之說者曰，英雄者，人間之造物主也，人間世之大事業，皆英雄心中所蘊蓄而發現者，总謂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傳記，殆

无不可也，故有路得而后有新教，有哥伦布然后有新洲，有华盛顿然后有美国独立，有俾斯麦然后有德国联邦。为后之說者，英雄者乘时者也，非能造时者也，人羣之所漸漬积累旁薄蕴蓄，既已持滿而将發，于斯时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虽有利益及于人羣，要不过以其所受于人民之利益而还附之耳。故使路德非生于十六世紀而生于第十世紀，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十六世紀即无路德，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其它之实例亦然。虽无哥伯尼，地动之說終必行于世，虽无哥伦布，美洲新世界終必出現。余說两說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稍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①

在这一段話里，可以看出梁啟超对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調和态度。他以“两說皆是也”来解决这个問題。因之，他就不可能解决英雄和人民羣众的真正关系。我們看来，只有人民羣众才是时势的决定者，也才是英雄的造就者，当然，我們并不排斥英雄的作用。而英雄的作用，只是由于他正确地反映了人羣的需要和时势的需要。

另一篇是他的“历史研究法”。正是在这一篇里暴露出梁啟超的历史唯心主义，他抛掉了調和的态度走向了唯心主义的一元論。

他写道：“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問題，則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換言之，則所謂‘历史为少数偉大人物之产儿，’‘英雄傳即历史’者，其說然耶否耶？罗索曾言，‘一部世界史，試將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論吾儕不能不認為确含一部分真理，試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将如何？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顗，失一玄奘，

^① “飲水室全集”杂文类第42卷。

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陸九淵，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顧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當何如？……此等人得名之曰‘歷史的人格者’。何以謂之‘歷史的人格’者，則以當時此地的演生的一羣史實，此等人實為主動——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動，而其人面影之擴大，幾於掩復其社會也。”

在這一段話里，雖然梁啟超只說，羅素的話，含一部分真理，或者說英雄事實，最少亦一部分主動，似乎在這裡還有一些伸縮余地，而在實質上他基本上是承認了“英雄傳即歷史”的理論。他在这里把杰出人物叫做是，“歷史的人格”而在後邊又叫做是“首出的人格”，並且進一步把這種首出的人格加以時代化，例如他說：

“戰國的政治界，可謂商鞅個性之時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謂王守仁個性之時代化”，正是他的歷史唯心主義的反映。

總之，由於梁啟超所處的歷史時代和他所代表的階級力量以及他從進步又轉向反動的政治地位，對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混淆不清以至於最後地堅持着唯心主義的觀點。

俄國的民粹派者在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出現之前，是以革命的姿態向着沙皇政府進行革命鬥爭的。可是民粹派者有一個極端錯誤的英雄創造歷史的理論。民粹派的米海洛夫斯基、拉弗洛夫等，錯誤的認為杰出人物和羣眾的關係，是“積極的英雄”和“消極的羣氓”對立的關係。“消極的羣氓”只有等待“積極的英雄”去解放他們，因此他們只能跟着英雄人物走，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為此，民粹主義者拒絕在工人和農民中間進行羣眾工作，而採取個人恐怖的鬥爭手段。民粹派者的這種“積極英雄”和“消極羣氓”的理論和馬克思所曾經批判過的青年黑格爾派布魯諾、鮑威爾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布魯諾、鮑威爾就是把少數的出類拔萃的人物作為積極的精神和他們認為沒有生氣的羣眾對立起來，他們認為勞動

羣衆是“精神之敵”、是“惰性的物質”、是阻礙歷史發展的力量，而只有批判的思維人物，才能够以他們的批判活動推動歷史前進。

俄國民粹派的觀點，不像梁啟超的觀點那樣混淆不清，他們是斬釘截鐵地說積極的就是積極的，消極的就是消極的。無疑的就是英雄創造歷史，羣衆只能跟着英雄走。

孫中山先生的前期思想，這種民粹派的觀點，也是十分顯著的。他同樣地把人類劃分為幾大類，他在民權主義的講演中曾有一段典型的說法。

他說：“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根據呢？就是根據各人的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够想出很多道理，听一句話，便能够作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够創造發明，只能跟隨摹倣，第一種人作出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一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事業的進行，都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身上”。①

顯而易見，孫中山先生這種對於人類的劃分法和俄國民粹派的两種人的劃分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雖然是多了一個後知後覺的中間層，但這個中間層實際上還是屬於第一類。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

① 鄧文儀編：“中山先生全集”，上集146——147頁。

是孫中山先生指出：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身上，這總是比俄國民粹派前進了一步。可是在後邊他又以建築為例：繪圖的工程師是先知先覺，看圖的工頭是後知後覺，砌磚蓋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覺。顯然，這個砌磚蓋瓦的實行家，按照他的說法總是一個不可缺少力量，卻依然還是一個不知不覺的被動的消極力量。

因此，可以斷定孫中山先生的前期思想，民粹主義的色彩是十分濃厚的。而且在他的政治活動上也有所表現。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行動和辛亥革命都還沒有充分注意到羣眾運動，比起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遠為遜色就是最好的明証，（當然這些鬥爭都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事件）

但是接受了十月革命影響和中國共產黨幫助的孫中山先生，就大大不同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使被人冷淡的舊三民主義轉變為被人歡迎的新三民主義亦即革命的三民主義。而新三民主義的重要革命表現之一，就在於孫中山先生注意到工農羣眾的問題。他說：“吾人欲証實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蓋維國民黨與羣眾深刻結合之後，中國民族真正的自由獨立始有可望也。”他又說：“中國以內，自南至北，自通商都會以至窮鄉僻壤，貧乏之農民，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十分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十分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須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中山先生的晚年革命生活不斷地注意到工農的組織和武裝，正是他在政治思想上重大進步的表現。他在遺囑中說：“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就可以看出他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比他的革命初期發生了如何重大的變化。當然，還必須指出，就是這樣，孫中山先生還是不可能

真正在科学的基础上認識人民羣众是历史發展的決定性的力量的。

从以上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进一步研究这个問題的特殊意义。

这就是說：曾經一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梁啟超，以及在俄国曾經一度認真进行过反对沙皇斗争的民粹派，特别是我国的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人民羣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問題上，也是有着而且是不能不有着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的。而事实証明，持着这种观点去进行革命斗争，是不可能取得真正徹底的胜利的。除开从改良主义立場最后走上保皇党立場的梁啟超不說，俄国的民粹派是真的用炸彈把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炸死，可是炸死了亚历山大第二，又出来了一个亚历山大第三。在孙中山先生領導之下也真的造成了顛复滿清政府的偉業，可是代之而起的却是袁世凱的称帝和北洋軍閥的混战。

这就說明了英雄創造历史的观点，不仅可以象公开的意志論、宿命論那样用以巩固反动的統治階級利益，而且也可以导致那些好心好意的革命家(那怕是不屈不撓的偉大革命家)所領導的革命事業遭受失敗。俄国民粹派特别是中国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显著的例子。更用不着說空想社会主义者聖西門、傅立叶和欧文了。

必須指出，要完全科学地解决人民羣众和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問題，正象和發現馬克思主义的其它原理一样，一个是历史的客观發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一个是徹底的革命的階級立場問題。

由于資本主义的發展，人們已經有可能發現历史發展的客观規律性，而在这个客观規律性的被認識的过程中，提供了科学地認識階級斗争的历史作用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提供了科学地認識人民羣众在历史上的決定性的作用的条件，作为无產階級的思想家——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地科学地解决了这个几千年来極為混乱和复杂的

問題。

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神聖家族”一書中，尖銳地批判了青年黑格爾派布魯諾·鮑威爾把勞動羣眾說成是“精神之敵”和“惰性的物質”的“英雄創造歷史”的反動理論。

在這裡有必要轉抄列寧哲學筆記中的一段話，在這一段話里，可以明白地看出馬克思批判鮑威爾的觀點的尖銳性，也可以明白看出馬克思在解決人民羣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的思想的深刻性：

“第88頁——90頁”，這一小節（第六章：《絕對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魯諾先生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1）絕對批判的第一次征討。（a）《精神》和《羣眾》）極其重要，這裡批判了這樣一個觀點：似乎由於羣眾關心歷史，似乎由於指靠羣眾（羣眾是滿足於對“思想”的“表面”理解的），因而歷史是沒有成效的。

《因此，如果絕對的批判為了《表面性》而真的譴責什麼東西，那末這就是譴責過去的全部歷史，因為歷史上的事業和思想都是《羣眾》的事業和思想，絕對的批判推翻羣眾的歷史並打算用批判的歷史來代替它（參看尤利·李赫先生的論英國生活中的迫切問題的文章）。》〔第88——89頁〕

《《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它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難了解，任何得到歷史承認的羣眾的《利益》，當它最初出現於世界舞台時，在《思想》或《觀念》中遠遠地超出自己的實際界限，很容易使自己私人的一般利益混合起來，這種錯覺構成傅立葉所說的每個腐敗時代的色調》——用法國革命的例子闡明了這點，並說出了一句名言〔第90頁開頭〕：

《腐敗活動是羣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羣眾範圍的擴大》。

在鮑威爾那里，精神和羣眾的分离達到了任何種尖銳的程度，

这可以从下面那句遭到馬克思抨击的話中看出来：《精神的真正敌人應該到羣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到其他什么东西中去寻找。》〔第90頁〕

馬克思回答說：进步的敌人是已經独立存在着的（Veroelstannbigten），羣众自卑的产物，但这种产物不是观念的，而是物質的，外在的。早在1789年路斯达洛編輯的報紙上就有过这样的箴言：

偉人們之所以看起来偉大，

只是因为我們自己在跪着。

站起来吧！

馬克思在这里所說的“历史上的事業和思想都是《羣众》的事業和思想”“《历史活动是羣众的事業，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羣众范围的扩大。》”是極為深刻的天才思想，它随着历史的發展而日益放射出无限的光芒来。

随着俄国資本主义的發展，俄国工人階級日益成为能进行有組織的革命斗争的强大先进力量的时候，遇到了民粹派的思想阻碍。在当时还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哈諾夫首先批判了民粹派的錯誤观点。而这个斗争的徹底胜利，是由列宁光輝的完成了。俄国革命正是由于粉碎了民粹派的观点而大踏步地前进了。通过二月革命發展成为轟轟烈烈的羣众性的十月革命的偉大斗争。依靠工人階級依靠羣众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的斗争并取得革命的徹底胜利，是十月革命極偉大極優良的傳統之一。

我們党的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对于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始終予以高度注意，并且繼續着發揚着光輝的十月革命的傳統，在中国革命的每个阶段上，都和党内的任何脱离人民羣众的傾向进行批判，同时对于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潮进行不妥協的斗争，从而使中国人民贏得两次革命的偉大胜利。

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不注意到：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是人民羣眾的事業，而人民羣眾的事業，是不可能不由人民羣眾自己起來進行鬥爭而能夠取得和鞏固勝利的。同時，馬克思主義也還不能不注意到，我們承認人民羣眾在歷史上的決定性的作用，決不是否認傑出人物的作用，正如列寧所告訴我們的一樣，我們必須全面地來考察這個問題。

二 人民羣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

馬克思主義既然指出決定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階級社會的發展動力是階級鬥爭，這就會自然而然地進一步得出人民羣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的結論。

既然社會發展的歷史，是生產發展的歷史，是生產方式也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歷史，那末，它就不可能不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的歷史，就不可能不是勞動羣眾的歷史。因為，只有它們，才是生產過程中的基本力量，沒有這個基本力量，就不可能創造出為社會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也同樣是十分顯然的，階級鬥爭既然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在階級社會里，新的生產力突破舊的生產關係是通過階級鬥爭來實現的，而人民羣眾又是決定着進步的革命的階級、取得鬥爭勝利的主要力量，沒有這個主要力量，就不可能冲破舊生產關係的桎梏，解放新的生產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主席語）顯然這是絕對無疑的。

我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人民羣眾在創造社會物質財富中的作用。

恩格斯在他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說過：“政治經濟學家們肯定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勞動確實

跟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提供劳动以材料，而劳动把材料变为財富。但是劳动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并且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致我們在某种意义上應該說：劳动創造了人本身。”^①首先，是劳动創造了人类本身，而劳动又把自然界的材料变为社会財富，从而，劳动是整个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創造了人类本身而劳动又延續了人类本身。这就可以明白看出：劳动，同时也就是劳动者在人类历史發展上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了。人类是要吃、要穿、要住、要行的，而这一切都必需一定的物質資料。而要生产这些物質資料，就必需生产这些物質資料的生产工具和使用这些工具。一切社会財富，除非自然界所供給的材料外，起決定作用的是劳动者。劳动者是創造这些社会財富的真正負担者。中国古書上講：“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按我們的观点看来，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而只能是劳动的人，亦即劳动者。

从整个历史的發展看来，从第一把原始的石刀石斧一直到今天的苏联的現代的原子發电站，也就是从人类的石器时代直到原子能时代，人类在生产工具的發展是日益翻新的。可是，任何生产工具的出現和使用，是和劳动者的双手分不开的。以我国为例，即可以充分說明这一点。旧石器时代，中国猿人創始了无定型的原始石器和骨片工具，河套人、山頂洞人，石器已有了新的进步（尖状、刮削、斧状石器等）；新石器时代，在赤峯紅山發現的新石器中有磨制的石斧、磨制的带孔石刀，有較大的犁状的打击石器，也还發現了石磨盘、石棒和石杵等；仰韶文化系統的新石器有磨制的石斧和石刀；龙山文化系統的新石器亦有磨光的石器同时还有蚌器；长江以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80頁。

南东南沿海一带，也有同样发现。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古老先人，在脱离了猿猴世界之后，为了自己的生存，在生产工具的创造上，就是根据今天考古学家所能够掌握的材料已是大有可观了。而随着社会生产工具的发展，在红山已有纹饰陶器，仰韶文化以彩陶著称，龙山文化又以黑陶著称，长江以南地区又以拍印的几何纹的硬陶器为其主要特点。从陶器的发展上可以看出我们古老先人如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日益创造着新的社会财富，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仰韶文化遗址中兽骨是很多的。经过对兽骨鉴定证明，当时对猪的饲养是很发展的；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关于兽骨的鉴定就发现有狗、兔、马、猪、獐、鹿、麋鹿、羊、牛等九种之多，其中以猪骨、狗骨为最多，兔骨为最少。这可以证明当时的牧畜业已有相当发展。而从各种耕具、陶器及其他迹象看来，农业种植也有一定发展。这就又说明了他们在和自然界的残酷斗争中，已在改变植物驯服动物方面作出初步成绩。中国神话中所歌颂的神农氏、伏羲氏、燧人氏的功德，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古老先人的集体劳绩的歌颂。

从石器生产进入金属工具生产的新时期，劳动者的伟大创造力量有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我們曾經講过的在殷代所出現的重达一千四百斤的司母戊鼎而言，已經完全可以看出在当时青銅器的发展程度。在当时已經开始了人們之間的阶级分化，只有奴隶才是劳动的負担者。而当时的社会财富，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而大大地增加了。卜詞中所見的农作物以黍为最多，麦次之。黍、麦已成为当时的重要食粮。蚕、桑、絲、帛等字亦屢見于卜詞。証明殷代奴隶主已經穿上了美丽的絲織衣裳。关于西周，即根据詩經的某些篇幅，即可以看到生产的发展，例如“周原既既”“黍稷薿”“荏菹旆旆”，禾役穞穞，麻麦幪幪，瓜瓞嗶嗶”（生民之什）、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食，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

农民之庆”，（甫田篇）——这些生动的句字，正是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农业盛况，而特别是周族发现了比黍、麦更为易于种植和更为普通的新的粮食品种——稷，这是对农业的一大贡献。牧畜业和手工业，西周比殷代亦为前进。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的比較广泛应用，又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在战国时代如齐、楚、韩、赵、魏、秦若干国家的城堡，变成了繁荣的城市：齐国的临淄人口达七万户，万户之邑已所在多有，魏国的大路上，昼夜马车络绎不绝，即可见当时的劳动者，贡献给社会的财富是越来越大了。

中国的封建社会为时较长，生产工具的改进较慢，可是劳动人民在几千年来支付了高度的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造成了汉、唐、宋、明几个封建经济重要发展的时期。即在生产工具的改进上，也可以看出劳动者的创造力量。在这里我们应该感谢宋代的沈括和明代的宋应星这两位伟大的学者，前者写出“梦溪笔谈”，后者写出“天工开物”，这是两部古代稀有的注意生产的著作。在这两书中把劳动人民在生产上的创造，作了重要的描写和概括（特别是天工开物）。从这两本书以及其它材料方面，清楚看出在封建社会条件下，劳动人民对生产工具的改进的惨淡经营坚持不懈的努力。从秦汉到明代之前，在农业主要生产工具的发展上，有耒耜、踏犁、连枷、耨耨、拖耙等；在水力工具的发展上有筒车、牛车、踏车、拔车、桔槔、轆轤等；在纺织工具方面有木棉搅车、纺车、织车等；而在采矿和锻冶工具方面有鑿井机、吸卤机和水力冶铁鼓风炉等；在交通工具方面，车船之类亦不断发展甚至有使用转动机的千里船等。这些工具的制造和改进，往往是数百年才发生若干变化，可是这个变化，就是数百年来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积累。而且有些工具，直到今天在生产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古代的生产發展历史上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我們先人的劳动創作提供了全世界意义的貢獻，这就是关于紙、印刷术、指南針和火藥的發明。尽管这些發明，往往是和某些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例如說：紙是汉代的蔡倫發明的，印刷术中的活字鉛，是宋代畢升發明的，可是据历史学家考証，他們的發明，无例外地都是集中了多少年来的劳动者的創造結果。即以紙为例，蔡倫是在公元105年把它試制成功的紙送給当时的皇帝，可是历史証明在公元前一世紀末年以來中国即有用絲絮造成的紙，为此，紙字是从系而氏声的。这就是說，蔡倫并不是紙的首次創造者，而是紙的重大改进者。当然，这並沒有減輕蔡倫的功績，而正是說明了他是总结了劳动者的創造經驗而又改进了它。至于其它的發明，也正是如此。这几項偉大發明的世界意义，已是全世界人們所公認的了。

而这种劳动人民的創造在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是一样的，在这里用俄国的托尔斯泰的一段有名的話来总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劳动業績也是完全一样的。这段話就是：

“我正在讀索洛維約夫的历史，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一切都不象样子：殘暴、搶劫、强制、粗魯、愚笨、低能。……俄国的历史是一团糟构成的。

可是，这一团糟，怎样会产生一个偉大的統一的国家来呢？

讀到那些关于搶劫、統治、战争、破坏的問題（历史上所談的也就是这些）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到一个問題：那些被破坏了的東西，是誰制造的？是誰怎样用粮食养活了全世界的人們？是誰制造出了絲綢、呢絨、衣衫、錦緞，叫皇帝和貴族們穿着出風头？是誰捕来了贈送給外国使节的玄狐和黑貂？是誰采掘了金矿和铁矿？是誰飼养了馬还和牛羊？是誰建筑了房屋、宮殿和教堂，是誰运来了各种各样的商品？……”